

西夏文

# 《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

对勘研究

孙颖新 著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НАУК

ДРЕВНЕЕ АЗ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夏文  
《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  
对勘研究

孙颖新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文《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对勘研究 / 孙  
颖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201-4431-5

I. ①西… II. ①孙… III. ①西夏语 - 佛经 - 研究②  
《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 - 研究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0722号

## 西夏文《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对勘研究

著 者 / 孙颖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 编辑 /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 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55千字

版 次 /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431-5

定 价 / 148.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佛教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 目 录

导 言.....	1
一 西夏佛经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1
二 西夏佛经的初译和校译活动.....	7
三 西夏佛经初译本和校译本中的通假现象.....	12
四 西夏文《无量寿如来会》初、校译本对勘释读.....	17
凡 例.....	20
释 读.....	22
附录一 汉文《无量寿如来会》第五会之一.....	295
附录二 汉文《无量寿如来会》第五会之二.....	306
参考文献.....	316
索 引.....	322

# 导 言

西夏是曾经统治中国西北地区近 200 年的一个古代王朝。这个王朝于公元 1038 年由党项部族首领元昊（1004—1048）正式创建，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其后历经十代君主，最终于 1227 年被蒙古灭亡。党项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白高国”（祥瓦𢙎𢙁）或者“白高大夏国”（祥瓦𢙁𢙁瓦𢙁），“西夏”是中原人对它的称呼。这个国家保留至今的文献大都是佛教著作的西夏文译本，一般认为西夏文佛经是其最突出的文化标志。

对西夏佛经的研究历史迄今已有一个世纪。本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西夏佛经初译本和校译本的对勘，系统论证西夏佛经中存在用字的“通假”现象，这一论证主要以解读《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为基础，同时兼及其他夏译汉籍。

## 一 西夏佛经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首次发现西夏文古书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900 年的庚子事变中，伯希和同他的两个朋友在北京北海白塔的一堆废纸和旧书里找到了六册泥金西夏字抄本《妙法莲华经》。<sup>①</sup> 这六册佛经现在分别收藏在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和波兰的雅盖隆图书馆，<sup>②</sup> 原件照片日前由

<sup>①</sup> 参看伯希和为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写的评论，载 *T'oung Pao* 29, 1932, pp. 226–229。

<sup>②</sup> 有三册《妙法莲华经》是二战期间从柏林图书馆转移到雅盖隆图书馆的，现在柏林还保存着当年转移文献的记录（上架号 *Libri sin. 1414*），但是原件去向不明。

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刊出。<sup>①</sup>此后他又在1908年3月来到敦煌莫高窟，在北区的两个洞窟里发掘出了200多件西夏文佛经的残叶。这些残叶现在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部照片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刊布。<sup>②</sup>在那两个洞窟里伯希和还同时找到了一些回鹘文的木活字，并且看到一件西夏文残片上面有元代的施经牌记，所以推测那里曾是个元代的印经作坊。<sup>③</sup>他的发现品大多是常见佛经的译本，其中有待仔细研究的只有一部题为“二十一种行”的佛教著作。

伯希和在莫高窟发现西夏文佛经后不到一个月，科兹洛夫（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率领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来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找到了30多本西夏文的书和账簿。1909年6月科兹洛夫奉命再次来到这里，他从西城墙外旧河床边的一座佛塔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文献和文物库藏。这批发现品随即被运回圣彼得堡，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中的文献部分有近九千个编号，占全世界所藏党项文献总数的90%以上，构成了迄今世界上最丰富的、学术价值最高的党项文献特藏。不过其确切数量目前还无法统计，有人估计有十余万叶，20世纪的西夏学就是在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批文献中的西夏文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第7册以后。<sup>④</sup>不过，由于发生粘连和霉变的大量原件在入藏后还没有经过修复，无法提供拍摄，所以要想刊布俄国收藏的全部资料还是个非常遥远的目标。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收获吸引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他在1914年夏天也来到了那里，希望找到科兹洛夫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带走的一些东西。斯坦因这次的收获已知的有4000多个编号，现在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藏品已经由上

<sup>①</sup> 史金波、克丽斯蒂娜·克拉美罗蒂编《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西夏文献》，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

<sup>②</sup>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sup>③</sup> [法]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耿昇、唐健宾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第383页。

<sup>④</sup>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发现这批文物的具体过程，参看第1册卷首的克恰诺夫序言。

海古籍出版社刊布,<sup>①</sup>而印度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则连规范的目录也未见发表。斯坦因发现的西夏文献大都是佛经残本，有些甚至只是碎片，其学术价值无法与俄国藏品相比。

1917年，宁夏灵武县在修城墙时发现了五个瓦坛，里面装满了西夏文的佛经。这批佛经从发现之初就开始零星地散失，遗存部分在1929年被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收购，现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后来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头重复刊布。<sup>②</sup>散失的经卷落入国内收藏家之手，其中有些被卖到日本，分别收藏在日本的几家图书馆，后来由中华书局全部刊出。<sup>③</sup>这批佛经大都是保存完整的元代刻本或者活字印本，其中一部分在明代经过修补。<sup>④</sup>20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的西夏学研究主要以这批文献为基础。

1973年，格林斯蒂德选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分西夏文佛经，汇编为九卷本的《西夏文大藏经》，在印度的新德里刊布。<sup>⑤</sup>这套书收录的大都是译自汉文的常见佛经，且编辑体例不够完善，图版质量不高，所以没能在西夏学界产生足够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徐炳昶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丝绸之路沿线有些零星的收获。40年代初，张大千也在敦煌得到了一些残片。这些收集品后来的去向并不十分明确，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馆的收藏品外，人们一般认为当今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sup>⑥</sup>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sup>⑦</sup>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图书馆，<sup>⑧</sup>

<sup>①</sup>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

<sup>②</sup>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11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2007；宁夏社会科学院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

<sup>③</sup> 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华书局，2011。

<sup>④</sup> 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考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sup>⑤</sup> Eric Grinstead, *The Tangut Tripitaka*, 9 Vols,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73.

<sup>⑥</sup> 瑞典的藏品迄今只发表了一张照片，见K.B. Kepping,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Tangut Empire as Reflected in the Native Tangut Text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1.2, 1995。

<sup>⑦</sup> 荒川慎太郎“プリンストン大学所藏西夏文佛典断片（Peald）につい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83, 2012。

<sup>⑧</sup> Nie Hongyin, “Tangut Fragments Preserved in the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И.Ф. Попова сост. *Тангу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2.

北京大学图书馆、<sup>①</sup>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sup>②</sup>以及日本的个别收藏都来自这里。

20世纪下半叶以后发现的西夏文书籍主要来自四个地方，即敦煌莫高窟、甘肃武威市附近、内蒙古黑水城附近，以及宁夏银川市附近。其中敦煌发现的文献收藏在敦煌研究院，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和张义乡小西沟岘发现的文献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新华乡亥母洞发现的文献收藏在武威市博物馆，这批文献中的西夏文部分大都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布于《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sup>③</sup> 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组织人力对黑水城进行了再次发掘，找到了西夏佛经残纸200多片，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在距黑水城几十公里的一处寺庙遗址内发现了一些相对完整的西夏文佛经，这批资料收藏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处，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布于《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sup>④</sup>

由中国考古工作者完成的最丰富且最有学术价值的发现都来自宁夏的贺兰山。这些文献共分两批，一批在1991年发现于拜寺沟方塔，另一批在2006年发现于山嘴沟石窟，全部资料已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刊布。<sup>⑤</sup> 宁夏发现的佛经相对完整，有些经本译自藏传佛教作品，其详细内容和来源至今还不完全清楚，甚至难以判断它们是来自西夏时代还是元代，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个热点。

到目前为止，除俄国的藏品还有待陆续整理出版外，世界各国主要的党项文献特藏都已在中国发表。这些出版物的编辑质量参差不齐，总的说来，对于原先编目比较成熟的特藏，编辑的质量就高些，而对于原先没有编目或者编目不够成熟的特藏，编辑的质量就差些。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英藏黑水城

<sup>①</sup>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302~306页。

<sup>②</sup> 林英津：《史语所藏西夏文佛经残本初探》，《古今论衡》2001年第6期。

<sup>③</sup>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sup>④</sup>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sup>⑤</sup>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山嘴沟西夏石窟》，文物出版社，2007。

文献》，这部书只是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依照最初的流水号一件一件地简单排列，而图版的定题工作则做得粗疏，更没有考虑同一文献的残片缀合和整编。

除去早期文献辨识阶段的不完整著录之外，<sup>①</sup>迄今学界做出的西夏文献目录有四份。最早的一份是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1963年发表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sup>②</sup>其中著录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非佛教著作60种，佛教著作300种。由于当时人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在非佛教著作上面，所以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佛教文献部分仅列出了书题，并附以对应的汉文和梵文。

第二份目录是西田龙雄的《西夏语佛典目录》。<sup>③</sup>作者在前人著录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从世界各国收集来的资料，在迄今所有同类著作中取材最广。另外，西田龙雄还尽量考察了夏译佛教著作的来源，其中一部分勘同意见被后来的克恰诺夫目录所采用。不过，目录中对藏传佛教译本的勘同似乎大多停留在经题的层面，并没有进一步核查藏文佛经正文，<sup>④</sup>所以其结论并非全然可信。

第三份目录是史金波的《西夏文佛经目录》。<sup>⑤</sup>这份目录的俄国藏品部分直接录自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日本和欧洲藏品部分直接录自西田龙雄的《西夏语佛典目录》，中国藏品部分有一些是作者亲自调查搜集的结果。不过遗憾的是，目录中对每一种著作都仅列出了西夏文的经题和汉文的字面翻译，并没有做出必要的描述和说明。

第四份目录是克恰诺夫的巨著《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sup>⑥</sup>著录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收藏，不但所收著作种类多于当年的《西夏

<sup>①</sup> 早期的目录为龙果夫和聂历山所编，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0。

<sup>②</sup>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sup>③</sup>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III，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

<sup>④</sup> 例如西田先生据书题推测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译自宋沙门遵式所集《往生净土忏愿仪》（《西夏文华严经》III，第13页），事实上这两种书的内容毫无关系。参看孙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译释》，张公瑾主编《民族古籍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sup>⑤</sup>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第343~413页。

<sup>⑥</sup> Е.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文写本和刊本》，而且为每个编号的藏品写下了迄今最为详细的介绍。

例如对《长阿含经》的著录：

### 佛说长阿含经

译自汉文，见《大正藏》第1号，西田龙雄《西夏语佛典目录》（西夏文华严经）第194号。

#### инв. № 150 卷十二

写本经折装，折面31×12厘米。41折+2折版画，佚卷尾。每折6行，行17字。有墨框，天头4厘米，地脚3厘米。经题后有译者题名：中国三藏法师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乾顺皇帝及其母梁氏皇太后御译，仁孝皇帝嵬名御校。首折有朱砂牌记一方，曰：“大白高国清信弟子皇太后罗氏新增写番大藏经一整藏，舍于天下庆报伽蓝寺经藏中，当为永远诵读供养。”用第1类纸。<sup>①</sup>

克恰诺夫目录对西夏文佛教著作的分类法相当复杂，大致可以概括为：作者首先把已经可以考定题名的佛经逐一与日本编的汉文《大正藏》目录和乾隆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目录核对，大致确定每部西夏文佛经的原本，同时依照其来源编为“见于汉文《大正藏》的佛经”和“见于藏文大藏经的佛经”两大类，然后再按不同的情况对译自汉文的佛经和译自藏文的佛经进行分别处理。译自汉文的佛经基本上参照《大正藏》的顺序以“经”“律”“论”排列，译自藏文的佛经基本上参照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的顺序排列。对于一时难以考订其具体来源的作品，作者只得大致参照西夏文经题中的用语进行分类，其次序为“经”“颂”“赞”“注疏”“义”“仪轨”“论”“记”“文”“集”“次第”“本”“品”“纲”“序”“部”，等等。由于西夏文中藏传佛教术语的解读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当前人们对西夏文经题中一些关键词语的翻译并不一定正确，所以上述对西夏文藏传佛教经典的分类自然也还不能视为最后的结论。

<sup>①</sup> 克恰诺夫把黑水城文献所用的纸张分成了八类，其中第一类大致相当于中国传统上说的“白绵纸”。

## 二 西夏佛经的初译和校译活动

佛教在西夏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在西夏建国之前佛教就传入了党项地区,《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在介绍开国君主元昊时说“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可见佛教当时已经在党项社会一定阶层的人士中盛行。《宋史》中还记载了党项人在1007年的礼佛活动:

(宋景德四年)罔氏薨……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

西夏在建国之初多次向宋朝请赎“大藏经”,<sup>①</sup>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曾下令建寺供奉,并同时开始由政府组织翻译佛经:

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sup>②</sup>

西夏的译经活动始于景宗元昊,经毅宗、惠宗、崇宗三朝,历时53年,译出佛经凡812部,3579卷。<sup>③</sup>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可以见到的早期译本都出自惠宗、崇宗两朝,时间大约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从12世纪40年代开始,西夏仁宗(1139~1193年在位)等几朝皇帝曾组织人力对前代翻译的佛经进行大规模的校译,校经活动一直持续到西夏灭亡。<sup>④</sup>光定四年

<sup>①</sup> 罗福苌:《西夏赎经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第2573~2574页;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59~62页。西夏的“赎经”活动罗福苌先生统计为四次,史金波统计为六次,聂鸿音先生指出,史金波依据的有些资料原始来源不明,恐非北宋时代的实录,所以实际的次数也许没有那么多。详见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0页。

<sup>②</sup>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第212页。

<sup>③</sup>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sup>④</sup> 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校经题记见于光定四年(1214)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影件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5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第309页。

(1214)刊印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尾存有神宗(1211~1223年在位)的施经发愿文,详细说明了校经的缘起,<sup>①</sup>聂鸿音先生曾全文翻译,现摘录如下:

今朕位居九五,密事纷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焚膏继晷,想柔远能迩之规;废寝忘餐,观国泰民安之事。尽己所能,治道纤毫毕至;顺应于物,佛力遍覆要津。是以见此经玄妙功德,虽发诚信大愿,而旧译经文或悖于圣情,或昧于语义,亦未译经解、注疏,故开译场,延请番汉法师、国师、禅师、译主,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细细校讎,刊印传行,以求万世长存。<sup>②</sup>

此前,西田龙雄在梳理存世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诸多译本后,发现两部佛经均有校译本和初译本的区别,并通过对勘,敏锐地感觉到校订重点似乎在音译用字上面。<sup>③</sup>史金波也从夏译佛经的题款中概略地了解并介绍了此事。<sup>④</sup>近十余年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进一步刊布,针对西夏佛经初译本和校译本的研究成了一股热潮。<sup>⑤</sup>由于有初译本和校译本同时存世的佛经相当罕见,所以每一份对勘资料的公布都会引人关注。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仁宗的校经活动大概始于天盛元年(1149),现存注明年代最早的校译本是天盛元年施印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俄藏编号 иhb.№ 6796)。根据存世佛经判断,仁宗往往同时校译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在校译西夏文本时会同时参考梵文、藏文原本,如俄藏西夏文《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御制后序》(иhb. № 6360)施经发愿文中所言:

<sup>①</sup> 《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安市文物局藏本,卷尾发愿文影件见史金波等《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图380。

<sup>②</sup> 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第150页。

<sup>③</sup> [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I, II,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75、1976;《西夏语研究与法华经》I, II, 《东洋学术研究》第44卷第1、2号, 2004。

<sup>④</sup>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79~83页。

<sup>⑤</sup> 对这一问题的总体认识见孙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经实践》,《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梵、蕃本《圣佛母般若心经》细细考校，译番汉本。<sup>①</sup>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中，署为仁宗时期校译的经典占大半。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顺正理论》《经律异相》《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也为仁宗时期校译本。

仁宗御校的西夏文本往往题署前代帝后和仁宗皇帝尊号。惠宗及梁太后初译、仁宗校译的题款典型格式是：

謚號能欽繼祿弘曉禮肅肅慈惠懷穆肅肅憲肅肅  
天生圓能祿番聖祐依法慈睦正國皇太后 梁氏 御譯  
妣欽須發彤嬪繼祿肅肅憲肅肅憲  
就德主國廣智增福民正久安大明皇帝 崇名 御譯  
謚號惟憲肅肅慈惠懷穆肅肅憲祿肅肅憲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崇名 御校

崇宗及梁太后初译、仁宗校译的题款典型格式是：

朕欽仰神功聖德，惟願陛下永昌洪業，萬世無疆。臣等謹叩頭。  
欽定四庫全書

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下面的“御校”也可以写成“详定”或者“再详勘”。

迄今所知，存世西夏文献中，存有初译本和校译本的佛经主要有以下

<sup>①</sup> 孙伯君：《墨水城出土西夏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译释》，《兰州学刊》2009年第7期。

几种：

《大方广佛华严经》(散琉璃经), 转译自实叉难陀汉译本。初译本为夏惠宗皇帝并太后梁氏共译, 写本经折装,<sup>①</sup>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校译本为元刊活字本, 原件 20 世纪初出土于宁夏灵武县城, 今分藏日本京都大学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京都大学所藏 11 卷的释读和对勘有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sup>②</sup>

《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द्वादशवर्षीया अवधिकारी विवरण), 转译自唐菩提流志编译本。西夏文本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初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7377, 为夏惠宗皇帝并太后梁氏共译。校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411、414, 为仁宗皇帝御校。

《大随求陀罗尼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初译本俄藏编号ИНВ. № 561,署天力大治智孝广净宣德去邪纳忠永平皇帝嵬名御译;校译本编号ИНВ. № 5757,译于仁宗在位时期。释读和对勘有张九玲《西夏文〈大随求陀罗尼经〉研究》。<sup>③</sup>

《佛说阿弥陀经》(辯疑跋闍儻彌茲), 初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4773, 刻于夏惠宗大安十一年 (1084), 为西夏现存注明年代最早的刻本。校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6761, 刻于天盛丙子八年 (1156)。释读和对勘有孙伯君《〈佛说阿弥陀经〉的西夏译本》。<sup>④</sup>

《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辯彌羅陀羅尼經)，转译自鸠摩罗什汉译本。西夏文本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初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951，校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809。释读和对勘有安娅《西夏文译本〈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考释》。<sup>⑤</sup>

《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 俄藏本为初译本, 法藏本为校译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 305–312.

② [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I, II,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75、1976。

<sup>③</sup> 张九玲:《西夏文〈大随求陀罗尼经〉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7。

<sup>④</sup> 孙伯君：《〈佛说阿弥陀经〉的西夏译本》，《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

<sup>⑤</sup> 安娅:《西夏文译本〈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本。<sup>①</sup>释读和对勘有西田龙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和《西夏语研究と法华经》(I)。<sup>②</sup>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歎庶頤麁穢姦麁穢麁穢麁穢),初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592,首尾皆残,译于西夏惠宗秉常(1068~1086年在位)时期。校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683,卷尾存桓宗天庆元年(1194)施经发愿文和校经题记。释读和对勘有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sup>③</sup>

《维摩诘所说经》(旃罽殻毘瑟瑟麁穢),转译自鸠摩罗什汉译本。西夏文本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初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2311,译于西夏惠宗秉常时期。校译本俄藏编号 ИНВ. № 737,译于仁宗在位时期。释读和对勘有王培培《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sup>④</sup>

通过新旧两种文本的对勘,此前西田龙雄和聂鸿音等已经指出了一些规律。在研究新资料的基础上,孙伯君综合上述各经新旧文本的不同,总结出诸多校勘实例,并将其概括为“析字义、别变调、申避讳、勘原文、订讹误、审对音、校咒语”等几个方面。

此前的研究在资料和结论两方面还都可以补充。在基础资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大宝积经》也同时有初译本和校译本之分,只是因为原书篇幅巨大,全部原件的照片近期还不可能发表,所以我们只有零星的资料可以参考。在结论方面应该指出的是,被学者此前视为“正讹”的一些校改用字实际上与原字在读音上有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那实际上不是简单的错字,而是像汉文古书里那样的“通假”。根据西夏文《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初、校译本中50余组通假字的校改实例,或可为仁宗时期的校经原则和校勘重点补充新的一点,即“校通假”。

① 《妙法莲华经》俄藏本,西田龙雄刊布于《ロシア科学アカデミー东洋学研究所サソクトペテルブルク支部所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日本创价学会,2005;法藏本,由伯希和(Paul Pelliot)、毛利瑟(M. G. Morisse)和贝尔多(F. Berteaux)于1900年在北京北海白塔下的一堆废纸和旧书里所得,贝尔多分得三卷,现藏吉美博物馆。绢纸金书写本,3册,经折装,每折6行,行19字。每卷卷首均有版画,第二卷首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汉译,当今皇帝奉诏重校正”。

② [日]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と法华经》(I)(II),《东洋学术研究》第44卷第1、2号,2004。

③ 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王培培:《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三 西夏佛经初译本和校译本中的通假现象

在汉文古书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记录一个词的时候本来应该写某个字，但是实际上却写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另外一个字。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云：

其始书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

例如在表达“四月份的清晨”这个词组时，本来应该写“四之日其早”，可是《诗经·豳风·七月》却写成了“四之日其蚤”——“蚤”（跳蚤）和“早”（清晨）在字义上没有任何联系，书写者借用“蚤”来表示“早”，仅仅是因为它们读音相同。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上称为“通假”，上面那个例子被解释为“蚤通早”，这很像现在说的“写别字”。有了对通假的认识，人们可以抛开字形而完全根据字音来理解古书的实际意义，这是清代“乾嘉学派”最突出的学术贡献。

上古时代没有使用汉字的统一规范，所以用哪个字记录哪个词在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书写者的个人习惯，有时甚至会使得后人难以判断当初何为“正字”。西夏文献中按说不该出现这类现象，因为西夏字的创制是一次性的政府行为，制成功后又有多种规范的字典问世，所以用哪个字来表示哪个词在文人心中应该是很清楚的。然而意外的是，西夏文献中的文字通假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少见，此前，我们在西夏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大宝积经》卷二十和卷三十六、《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妙法莲华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维摩诘所说经》、《孝经》、《正道心照》中都遇到了零星的通假字。日前，在对《大宝积经》卷十七和卷十八的全文解读中，我们见到了 50 多处通假字的使用，其中既有“同普通假”也有“近普通假”，既有“单音词通假”也有“复音词通假”，其中最多见的是“同普通假”：